

张闻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许佳君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张闻天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张闻天系统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思想,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主持实现党的战略和策略转变的过程中,坚持民主的领导作风,凝聚了全党智慧,为全党正式转变和确立新的策略路线奠定了基础,拉开了历史转折的序幕。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正式把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定为全党策略路线,并提出了各项方针政策。

关键词 张闻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确立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9)03-0009-04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由于领导地位和职务分工的关系以及对局势发展的敏锐认识和深刻把握,实现党的政治策略和路线方针转变的历史任务,首先由张闻天承担起来。张闻天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倡导者、制定者之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的整个过程中留下了不朽的丰碑。

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 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1. 战略转变和新的策略路线的酝酿

(1) 战略转变

在红军长征到甘肃渭城时张闻天就察哈尔事件写了《察哈尔事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并吞华北》,直接提出了“团结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帝的民众在自己的周围,开展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保卫中国民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1]269}。1935年10月22日,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陕北苏区,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党的战略任务是将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2]1}。提出了红军的战略转变问题,“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2]4}。在11月13日瓦窑堡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要“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来开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2]133}。

(2) 酝酿新的策略路线

张闻天在同一天主持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

出卖中国的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再次论述了党的战略是“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领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更为重要的是《宣言》提出了策略路线问题,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愿意实际地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蒋组织。^{[1]275}就抗日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灵活性做了新的解释,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初现端倪。

为了进一步促进全党认识的转变,张闻天在1935年11月17日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在两方面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党的统战思想。一是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出发,把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策略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问题作为中心任务向全党提出。二是就受“左”的思想指导下工作中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提出利用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

在长征结束前后短短的几个月里,在没有共产国际指导的情况下,张闻天就对党的战略和策略转变做出了独立的正确判断,为后来举行瓦窑堡会议,实行策略路线的转变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此时,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向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张浩回到瓦窑堡。张闻天听取了国际七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

线等精神,以及中共代表团起草的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的内容,并将这一情况函告在前线的毛泽东等人后,立即和后方领导同志研究共产国际的新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着手制定党的战略和策略。1935年11月28日主持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275},29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在会上作了报告^{[2]16-21}。12月1日为阐述《抗日救国宣言》的精神,张闻天写了《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抗日宣言》^{[2]22-29}。在这些宣言和发言中,张闻天除继续阐述已经提出的反日反蒋为主要内容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外,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对统一战线的策略作了重要的完善。

首先,在《抗日救国宣言》中提出了新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即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极大地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其次,阐述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相结合及批判关门主义的重要意义,强调灵活主动地运用统一战线。第三,强调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坚持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并在领导群众斗争中争取领导权。第四,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作为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共同纲领,统一战线联合行动的共同纲领。系统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思想,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 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领导全国统战工作

从1935年10月到12月上旬,张闻天在全力推动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及在此过程中主持起草所形成的文献,已经具备了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各种基本观点,为瓦窑堡会议决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5年12月17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在张闻天夫妇居住的窑洞里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于12月25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正式把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定为全党策略路线,并提出了各项方针政策。这个决议同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根据决议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1) 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

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党的新的策略路线。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

层的)”^{[2]41-50},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是“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2]41-50}。从阶级关系变动和党的主要历史任务的高度出发,提出了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并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作用,采取了正确的对待态度,抛弃了长期实行的“左”的教条的错误路线。

(2) 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广泛与最高形式

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提出了苏维埃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阐明了关门主义的危害,强调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2]41-61}。

二、推动国共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瓦窑堡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发起东征战役,张闻天则担负起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指导工作,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修改、补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 确立逼蒋抗日的方针

随着形势发展,各种矛盾不断显露,蒋介石抗日态度逐渐显现,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适时将“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抗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进一步完善。

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打破了蒋介石妄图依靠外交途径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1936年2月27日,董建吾带着国民党当局要求同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秘密来到瓦窑堡。在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后方领导同志,明确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1]286}。这时,中共中央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1936年3月20日至27日,张闻天在山西前线主持召开“晋西会议”,作了《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报告,提出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口号,并就在新的形势之下如何进行和开展统一战线提出了具体的方针。报告没有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而是认为“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应该“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的敌人”^{[2]80-87},标志着抗日联蒋的开始。张闻天于4月20日写就《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明确提出要知道“谁是民族革命中的

左派,谁是中派,谁是右派。我们的方针应该是同左派结成坚固的同盟,联合中派,而孤立右派^{[2]89-90}。直到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才确定‘逼蒋抗日’的方针,而国民党的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则是直接转机。

两广事变解决后,1935年7月蒋介石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内外政策有了一些调整,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了新的进行国共和谈的4个条件。同时,潘汉年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回国,途经香港、上海、南京同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会谈,于1936年8月上旬回到中央驻地保安。张闻天同潘汉年主要讨论了怎样进行国共谈判,实行第二次合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于1936年8月10日召集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从‘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转变。毛泽东作了报告,张闻天作总结性发言,全面、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方针的最初策略思想,并就如何争取领导权作了具体论述^{[2]148}。会后,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在起草的过程中于8月15日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提出‘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最好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1]286}。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郑重地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第一次大革命是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1]306}

9月1日,张闻天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党内发布,向全党说明逼蒋抗日的必要性和具体的内容^{[2]140}。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对蒋策略转变的一个标志。9月15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并作会议结论,特别强调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2]218}。9月17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系统阐述了张闻天在报告中的内容,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2]153-159}。提出在进入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新阶段进行统一战线所要坚持的原则。加强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决不放弃党对于苏区人民与原有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在统一指挥下保持红军组织上于政治上的独立性,注意红军的扩大与巩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与内部一

致性等等。为党领导统一战线,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2. 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

然而,蒋介石所说的‘中共问题的解决’实质上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接受改编,解除武装后再加以政治解决,仍寄希望于武力解决,这使得国共两党既存在合作抗日的可能,又存在极大的困难。所以当蒋介石解决两广事变后,调集军队准备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新的‘围剿’。同时对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加以打压,制造了‘七君子’等事件。这时,西安事变爆发了。

中国共产党在弄清事变经过,认真分析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后,认为西安事变仍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并可以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创造条件,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时,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岗位上,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一起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的解决方针。针对与会者中存在的以西安为中心建立抗日政府和反蒋、除蒋、审蒋的不同意见,张闻天坚持‘逼蒋抗日’的方针,指出西安事变的性质是以张学良为代表的抗日派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族妥协派’之间的矛盾,发展趋势是整个局势将‘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因此处理事变应坚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针对以西安为中心建立政权,张闻天指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而应‘把抗日为最高旗帜’,采取军事的政治的行动,来实现‘改组国民政府’的口号。对待蒋介石,应该‘尽量争取南京政府的正统’^{[2]198}。张闻天的这些论述为和平解决西安提出了正确的策略思想和解决方针。

随着事变的发展,各方面态度的显现和明朗及在西安的周恩来等对西安局势的观察,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936年9月19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西安事变的解决方针。毛泽东指明党的策略方针是和平调停,结束内战。张闻天在发言中分析了西安事变的两个前途‘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在抗日和对待蒋介石的关系上,张闻天再次强调:“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为了避免内战,实现全国抗日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但也要‘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2]200}。

从这两次会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张闻天是中国

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策略的主要决策者之一。1936年9月25日蒋介石口头许诺中共提出的6项条件恢复自由,但回到南京后扣留张学良,西安事变进入后期。此时各种矛盾犬牙交错,是和是战交织在一起,形势跌宕起伏。张闻天亲临西安,同整个中央集体一起致力于争取国内和平,西安事变终得和平解决。

为了巩固已经获得的来之不易的国内和平,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张闻天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5项要求和4项保证。5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财,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4项保证是:如果国民党将上述5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标志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现,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正如张闻天1937年2月11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革命确实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容是和平统一团结御侮”^{[2]225}。

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西安事变之后,张闻天作为中央总负责人,先后主持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和党在新的阶段的方针政策,为党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

首先,提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1937年3月3日,张闻天为阐发《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著文指出,在新的时期摆在中国共产党前的具体任务既是巩固我们开始取得的国内和平,并加速准备对日抗战^{[1]359}。为讨论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提出党的任务,1937年3月2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作报告,明确的把巩固和平,准备抗战,争取民主权利的实现作为党的任务^{[2]106}。其次,论证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23日的报告中,张闻天提出:“在各种力量的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争取领导权的问题”“要保障党的领导,开展党的思想斗争”^{[2]226}。第三,做好全党的思想准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时称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于5月

2日至14日举行,张闻天致开幕词,着重强调了怎样完成新的阶段内“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战争”的迫切任务,并就红军建设、党的建设进行了具体论述。会后又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张闻天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强调在新阶段反对关门主义和进行上层统一战线重要性。张闻天还具体参与领导了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为国共合作的开展作出了贡献。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七七事变,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4. 坚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反对右倾错误

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和国共两党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党如何处理抗日民族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国共两党的关系,成为对抗战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

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张闻天就鲜明地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在1937年8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作报告指出:“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批评起动摇与妥协”“反对满足、迁就的投降倾向”“提出中国共产党独立的主张”“迫使蒋走向我们方面,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参加国民党的合法团体与活动,“使成为公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组织”“造成推动南京政府的力量,而不是与之对立”^{[2]333-337}等。

1937年8月22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洛川会议,并作报告和发言。在论述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原则后,再次强调,只有共产党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有保障。洛川会议后,张闻天主持召开统一战线座谈会,在分析了新形势下党内产生右倾投降主义危险的各种因素后,着重强调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并提出了防止和克服右倾投降主义的措施。

从实现战略转变到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再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张闻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者之一,他的卓有成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参考文献:

- [1] 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 [2] 张闻天.张闻天文集:二[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